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决策部署的重大举措

□ 本报记者 石伟 李雪林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监察法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监察法的制定，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决策部署的重大举措。伴随着事关全局的这一重大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监察制度被赋予更丰富的内涵，寄予了更大希望，引发代表委员热烈讨论交流。对此，本报记者采访了部分全国人大代表。

监察法的制定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全国人大代表、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江必新认为，监察法的制定实施一定会产生很好的作用。从监察法形成的制度基因看，它是对中国传统制度文化基因的扬弃，是对革命根据地红色政权基因的继承和发扬，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对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监察实践经验的总结。从监察法制定过程看，比较好地处理了四个关系：一是较好地处理了改革和法治的关系，先改革，在改革的基础上进行总结上升为法律。二是较好地处理了母法和子法的关系，先修订宪法，宪法通过后再制定监察法。三是较好地处理了贯彻中央部署与充分体现民意的关系，在十九大报告提出制定国家监察法后公开征求各方面意见。四是较好地处理了民主和集中的关系。从监察法基本内容看，坚持了七个统一。一是坚持了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统一；二是坚持了党内监督与国家监督的统一；三是坚持了查处职务违法与职务犯罪的统一；四是坚持了资源集中与力量整合的统一；五是坚持了授权与控权的统一；六是坚持了相互配合与相互制约的统一，强调与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执法部门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七是坚持了严

惩腐败和保障相关人权利的统一，特别是在一些强制措施的使用上设置了条件和必要程序。从监察法的功能和作用看，一是巩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果，为反腐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武器；二是规范查处职务违法犯罪行为，确保反腐败斗争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三是加强了对公权力的监督，防止公权力滥用，对于保障人民权利具有重要价值；四是完善了国家政权结构，推进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五是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法治保障，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制定监察法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对于创新和完善国家监察制度，实现立法与改革相衔接，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反腐败工作，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厉莉告诉记者，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是中国共产党鲜明的政治立场，是党心民心所向。现在制定监察法是坚持和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领导，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国家监察体系的必然要求。改革的深化要求法治保障，法治的实现离不开改革推动。这次监察体制改革确立的监察制度，也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制度文化，是对中国历史上监察制度的一种借鉴，是对当今权力制约形式的一个新探索。

监察法的出台亮点纷呈

对于监察法出台的诸多亮点，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察委主任夏红民进行了盘点归纳。第一，监察法是彰显“四个意识”“四个自信”的中国特色反腐败国家立法，旗帜鲜明地宣示了党对

国家监察工作的领导。第二，这是一部对国家监察工作起统领性和基础性作用的法律，科学规定了监察机关的基本要素，为建立崭新的国家监察机构提供了宪法层面的“出生证明”。第三，这是经过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经验以法律形式的全面固化，明确了监察机关的职责权限、监察范围等，从源头上解决了“监察范围过窄、反腐力量分散、体现专责和集中统一不够”等难题，为新形势下反腐败斗争提供了坚强法治保障。第四，这是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有机衔接的又一制度样板，明确监察机关监督、调查、处置三项职责，与纪委的监督、执纪、问责相互映照，体现了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的区别性和一致性，折射出纪法衔接贯通的战略考量。同时，运用留置取代“两规”措施，将留置定性为非刑事强制措施，明确依照监察法规定收集的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是法治建设的重大进步。第五，这是对国家监察权从严监督制约的“法律之笼”，严格规定了国家监察机关的工作程序，并从接受人大监督、强化自我监督等方面对监察机关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昭示了“打铁必须自身硬”“信任不能代替监督”的鲜明导向。

推进监察法更好落地实施

谈到如何推动监察法落地生根、有力实施，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法学院中国司法研究中心主任周光权教授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建议。第一，各级监察机关要深刻理解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大意义以及监察法的立法原意。第二，各级监察机关要严格按照监察

法规定的程序处理案件，切实保障被留置人员的权利、被调查人的权利，在留置措施的使用上必须要慎重。要经过集体研究，要报上级备案，严格按照法定程序，防止非法取证，防止超期留置，防止滥用职权。将法律执行好，不负人民重托。第三，各级监察机关在执法过程中要和有关部门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监察机关采取留置措施以后，经过调查涉嫌犯罪的，要移送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审查以后也不是全都提起公诉，认为证据不充分的可以退回补充侦查，认为符合不起诉条件的可以不起诉。第四，各级监察机关要提升人员素质，强化内部监督。现在的监督措施包括人大的监督、检察机关的制约、媒体的监督、人民群众的监督等，这些监督措施有的是刚性的，有的是软性的，因此强化监察机关自身的内部监督很重要，这在法律草案条文里也有相关规定。

“要用有力有效的行动确保监察法实施到位。”全国人大代表、吕梁市委副书记、市长王立伟表示，一是坚持党的领导，认真贯彻落实监察法。二是以实际行动学习宣传好监察法。三是规范执行监察法。严格执行监察法规定，实现监察机关与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执法部门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机制，确保实现政治效果、纪法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当好“施工队长”，确保规范执行，不走样、不跑偏。四是强化监督约束，提高工作人员素质。按照“打铁必须自身硬”的要求，切实提高履职能力，强化自我监督和自我约束，强化队伍建设和对权力的监督约束，统筹抓好监察队伍政治和专业建设，全面提升政治觉悟和业务素质。

生活富裕是根本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衢州市委书记徐文光认为，乡村振兴，归根结底就是要让百姓富、生态美，通过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以生态促转型，大力发展美丽经济幸福产业，数字经济智慧产业“两个大产业”，让美丽更智慧，让智慧更美丽，实现传统产业弯道超车、新兴产业换道超车，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最大限度释放生态红利。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后，衢州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农民增收的措施：着力培育农民增收新动能，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全力促进低收入农户增收，系统推进产业开发、创业就业、结对帮扶、社会救助、健康保险、光伏扶贫六大工程；制定出台消除集体经济薄弱村三年行动计划及配套政策，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坚持物业经济、美丽经济、特色经济、合作经济等多条腿走路，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全面实施屋顶光伏富民工程，在农村安装屋顶光伏，促进农民增收；大规模开展农民素质培训，重点打造保姆、月嫂等区域品牌，进一步提升农民务工收入。衢州坚持以更高的标准优化人居环境，把农村作为一个大景区、大花园来统筹规划、整体推进，把“点上美”和“面上美”统一起来，变“盆景”为“风景”，实现乡村的山更绿、水更清、地更净，百姓更幸福。

治理有效是基础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全告诉记者，“要实现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最重要的还是解决人的问题”。在王全看来，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的基础，而要实现治理有效，最要紧的就是实现人才下乡。乡村振兴需要大量人才，而目前农村大部分青壮年人才都到城市发展了，农村干部存在年龄偏大、知识相对陈旧的问题，这就需要出台更有力度的政策措施，引导和鼓励优秀机关干部到农村任职挂职。与此同时，还要加强乡村治理，服务好村民、教育好村民、管理好村民。

乡风文明是保障

全国政协常委、民盟海南省主委、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康耀红认为，乡风文明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精神命脉。乡风文明作为反映

高质量发展努力的谱写新篇章

□ 本报记者 储峰 吕红娟

今年适逢改革开放40周年，站在这样一个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时点，如何推动我国经济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新进展成为两会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全国两会期间，本报记者采访了几位两会代表委员。

推动我国经济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新进展。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指出，2018年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着力打好三大攻坚战，推进形成适应高质量发展的体制环境。第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主线。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重在“破”“立”“降”上下功夫。以处置“僵尸企业”为突破口，建立市场化法治化退出通道，解决“退不出、死不了”的问题。大力培育新动能，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培育新的增长点。大力降低实体经济成本，大幅降低企业税费负担，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第二，打好三大攻坚战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打好重大风险攻坚战重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把控制企业杠杆率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作为重点，切实有效降低企业债务水平，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的法治化管理。打好脱贫攻坚战重在“精准”，瞄准特定贫困群众精准帮扶，向深度贫困地区聚焦发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重在打赢蓝天保卫战，明显改善大气环境质量。第三，深化改革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途径。深化改革重在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依法全面保护各类产权，增强各类经济主体的创新创业动力；完善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打破行政性垄断，防止市场垄断，发挥市场决定价格的作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通过深化改革，推进形成与高质量发展要求相适应的体制环境。

中央企业要作高质量发展表率。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徐福顺认为，中央企业有了一定的体量规模，2017年，48家中央企业成为世界500强企业。今后，应该更加关注强和优，更加关注“好不好”，要落实新发展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把提高供给质量作为主攻方向，通过改革创新，走在高质量发展前列。具体说来，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聚力、发力。一是加快制造业优化升级。推动制造业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二是将资源更多投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在生态保护修复、新能源汽车、工业互联网、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领域迈出实质性步伐。三是扎实推进瘦身健体，大力化解过剩产能。深入推进“压减”工作，力争年底大多数企业累计减少法人户数18%以上，压缩管理层级至5级以内。持续推进“处僵治困”，努力实现年底前“僵尸企业”基本出清和特困企业整体盈利。四是全面提高企业管理和运行质量。推动企业理念、目标、制度、经营全方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五是进一步扩大开放，提高国际化经营水平。抓住“一带一路”的机遇，抓好重点项目实施，打造深化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新平台，把对外投资和促进国内装备、服务、技术标准全方位走出去有机结合起来，积极培育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

高质量发展阶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居于突出位置。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认为，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求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引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将经济工作的着重点和着力点转到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上来。要求我们摒弃以往围绕GDP的规模和速度指标做文章、追求高速增长的思维和做法，更加注重在供给侧发力，更加着力在结构性调整上下功夫。要求我们更加着力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加强基础设施网络建设，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更加注重加快形成新动能，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更多增

长点；更要加聚焦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

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绍兴市委书记马卫光谈到，绍兴作为传统制造业大市，近年来工业经济特别是传统产业遭遇到了“成长中的烦恼”。挑战蕴含机遇，压力催生动力，在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绍兴市要积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打造新旧动能转换样板。我们要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深入践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按照“四个强省”工作导向和“六个浙江”建设任务，积极抓“一带一路”建设和全省大湾区、大花园、大通道建设机遇，加快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在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培育发展上下功夫，在大项目、大企业、大平台建设上求突破，在改革、开放、创新、人才上齐发力，努力把绍兴打造成为全省乃至全国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标杆、新旧动能转换样板。

建设好全国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宣城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冬云谈到，宣城是全国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优良的生态是宣城最大的优势和最宝贵的财富。实现宣城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主动对接承接沪苏浙新一轮产业转移，加大思想解放的力度，形成创新开放的高地平台，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到经济发展、生态优美、生活富裕、文明美丽和谐共生的生动局面。一是加快宛陵科创城和宣郎广宁智创走廊建设，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以科技创新助力绿色发展。二是加快实施中国制造2025宣城行动，积极发展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和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产业，持续实施传统产业“千企升级”。三是着眼于打造全国知名的旅游目的地，加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和泾旌绩文化旅游生态健康产业走廊建设，发展壮大文化旅游产业。四是大力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狠抓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品牌创建、质量安全监管，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五是加强生态建设和修复，扎实推进林长制、河长制、湖长制，让绿水青山成为追求更有质量、更有效率、可持续发展的基石；进一步强化节能降耗和污染减排，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着力解决环境突出问题，保障绿色发展。

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

——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热议乡村振兴

□ 本报记者 李玉梅 熊若愚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央明确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就如何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这个话题，本报记者采访了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

产业兴旺是重点

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曲靖市委副书记、市长董保同认为，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点，曲靖将在三个方面着力实现产业兴旺。一是坚决打好绿色食品这张牌，着力在质量兴农上求突破。实施产业兴村强县行动，发展高原特色产业，打造“一村一品、一县一业”发展新格局。完善农业标准体系，加快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体系，打造特色农产品绿色发展示范基地。推进农业与旅游、文化、教育、康养、体育等深度融合。二是抓住国内农业龙头企业在云南布局的难得机遇，着力在现代农业组织体系上求突破。力争每个重点产业引进一户国内排名前5名的现代大型企业集团，注重培育和扶持本土农业“小巨人”企业，积极引导鼓励普通农户、家庭农场组建农民合作社，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实现有机衔接。三是大力推动全产业链发展，着力在提高农产品深加工能力上求突破。

生态宜居是关键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荆门市委

副书记、市长孙兵认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生态宜居是重要任务、生态振兴是重要途径，必须让良好生态成为乡村振兴支撑点。针对如何做到生态宜居，孙兵代表提出了五点建议：一是坚持整饬之美和自然之美兼具。科学编制美丽乡村规划，高标准建设新型农村社区。同时，不搞大拆大建，注重保留村庄原始风貌和山水脉络。二是坚持形态之美与神韵之美共生。强力推进厕所革命、精准灭荒、乡村生活污水治理和城乡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等生态工程，大力实施农村环境治理行动计划，探索生态化、无动力或微动力处理农村生活污水的“客店模式”，建设农作物废弃物综合利用产业园和土壤修复产业园，重构青山绿水画卷。三是坚持乡土之美与现代之美兼修。四是坚持共性之美与个性之美并重。加快乡村振兴示范带和特色小镇建设，既坚持整体联动、全域推进，又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做到一村一韵、一村一景，真正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实现百姓富、生态美的统一。

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的主要标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被确定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要求和主要目标。我们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强乡风文明建设，助力乡村振兴战略。一方面，我们要加强政策宣传和思想教育。另一方面，我们要大力开展讲文明、树新风活动。积极围绕勤劳致富、维护公益、重礼守信、遵纪守法等内容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活动，引导农民群众建立乡规民约，培育文明家风，摒弃封建迷信、铺张浪费、厚葬薄葬、吸毒赌博、人情攀比等陈规陋习，形成勤俭节约、尊老爱幼、诚实守信、爱护环境、热爱国家的良好风尚。

治理有效是基础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全告诉记者，“要实现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最重要的还是解决人的问题”。在王全看来，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的基础，而要实现治理有效，最要紧的就是实现人才下乡。乡村振兴需要大量人才，而目前农村大部分青壮年人才都到城市发展了，农村干部存在年龄偏大、知识相对陈旧的问题，这就需要出台更有力度的政策措施，引导和鼓励优秀机关干部到农村任职挂职。与此同时，还要加强乡村治理，服务好村民、教育好村民、管理好村民。

乡风文明是保障

全国政协常委、民盟海南省主委、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康耀红认为，乡风文明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